

《清亡启示录》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清亡启示录》

13位ISBN编号：9787508634999

10位ISBN编号：7508634993

出版时间：2012-11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作者：马勇

页数：22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前言

自序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刚刚过去，就迎来了清帝退位一百周年纪念。在这特殊的日子，回顾大清帝国最后十几年走过的路，不禁感慨万千，令人欷歔。清朝的历史，从发端就与世界历史密切相关。满洲人入主中原创建大清王朝时，正值西方世界发生突变的前夜，大航路的发现，以及稍后蒸汽机的发明、工业革命，在使满洲人统治的中国被动地卷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潮流。对于世界经济一体化，中国人应该说已有足够准备，如果不是明清易代，按照晚明中西交流惯性，中国应该在徐光启、利玛窦这批中西智者的引领下，坦然踏上世界一体化道路，因为当时的中国已有接受外来文明的足够经验，也有文化上的足够储备。然而遗憾的是，满洲人毕竟是来自周边的一个弱小族群，他们入主中原创建帝国后，面临着汉化和西方化的双重压力。权衡利弊，清代统治者至少在乾隆大帝之前，选择了汉化优先的政策导向。满洲统治者迅速认同了中原文明，成为中原文明的信仰者、追随者。当然，也就中止了晚明以来公开且繁盛的中西文化交流。这是中国历史的遗憾，也是大清王朝的缺憾。经济上的世界一体化是工业革命之后必然要发生的，是世界上只要人迹能到的地方都无法避免的。事实上，清代统治者尽管遏制住了晚明中西交流的潮流，建构了一个虚假的中原文化繁荣，所谓康乾盛世，所谓乾嘉汉学，所谓《四库全书》，如果放到大历史背景中进行考察，与西方的差距真是不可以道里计。尽管如此，清代统治者的刻意封锁依然无法阻止住中西文明交流的潜流，特别是贸易上的诱惑，也使得中西之间的文化交流在那时只是一种管制性的交流，不是无限度自由的交流而已。管制性的交流也是交流，涓涓细流终究会汇成大河。中西文明在艰难环境中接触交流着，至十八世纪晚期，这种交流本身又构成了严重问题。西方人在对东方对中国的贸易推广中遇到了极大障碍，即中国的市场不开发不发育使中西之间的贸易严重失衡，西方需要中国的大量初级产品，比如茶叶，比如瓷器，都已经成为西方人生活方式中不可须臾或缺的东西。而在中国，西方工业革命形成了巨大的产能过剩，大量的纺织品急需中国这样人口众多的广袤市场。然而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太强大了，当然主要还是因为中国人靠天吃饭收入低下，当土布可以被洋布替代的时候不会超出购买能力去买洋布，当打火石还能打出火花的时候，也不会花钱去买洋火。中国市场的不开开发当然不利于中国人生活品质的提升，但对统治者来说，统治秩序的稳定可能还是第一位的。于是当马戛尔尼率领庞大的贸易代表团前来谈判时，乾隆大帝毫不犹豫地告诉他：大清帝国物产丰富，无奇不有，我们不需要你们那些东西。乾隆大帝的豪气引起了复杂的历史后果，中西贸易的不平衡引发了“罪恶的鸦片贸易”，也就仅仅三十年光景，一个原本算不上富庶但总算还能过得去的中国竟然被那个鸦片摧残得差点终结：中原已无可可用之兵，国库亦无可可用之饷。紧接着，就是以鸦片名义发生的战争。鸦片战争迫使中国进入世界一体化，五口通商使中国人的观念、生活形态都在发生变化，到了19世纪60年代，中国在经历了内乱外患多重打击后重新起步，踏上中体西用洋务新政的轨道，也就几十年时间，大清帝国元气尽复，又以世界大国的面貌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不幸的是，大清王朝的成功是因为行政主导的中体西用洋务新政，一次持续三十多年的大试验竟然在一场局部冲突中一败涂地。追根溯源，人们将责任归结为这场“跛足的现代化”，以为洋务新政只变其末不变其本，只要西方之用，不要西方之体，失败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知耻而后勇是中国人的优良传统，失败乃至惨败都不可怕。在经历了1894年的巨大刺激后，中国人很快重建共识，走进变法图强的“维新时代”，开始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注意参照东西方成功经验进行体制变革。遗憾的是，这场变革被1898年秋天的一场政变所打断，紧接着又是席卷大半个中国的义和团运动，直至1901年，中国重回政治变革的轨道，开始新政。又过了几年，开始君主立宪的预备。君主立宪是那时中国人的普遍共识，正像梁启超所说的那样，既然君主专制不合乎我们的需要，既然民主共和超越了我们的社会发展程度，那么执其两端而用中，君主立宪就是合乎中国国情的理想选择。然而，当这个选择即将成为现实时，清廷的几个技术性失误使先前的努力前功尽弃，一个王朝在一百天的危机中走进历史。历史无法遗憾，也不必惋惜，走过的就是走过了。只是一百年后回望大清王朝，特别是分析这个貌似强大的王朝为什么在一场危机面前不堪一击，这个过程究竟有哪些教训可以汲取？这是这本小书希望探究的问题。感谢《新世纪》的徐晓老师和刘芳小友，如果没有他们的敦促和经营，这些文字或许不会写出，更不会用这种方式呈现给各位。马勇，2011年12月8日

《清亡启示录》

内容概要

编辑推荐：

百年前的一百天，如何导致一个王朝的灭亡
身处变局的各色人物，又如何决定了中国此后的走向
那被妖魔化的晚清十年，真面目究竟为何？
更重要的是，这个危机启示了什么？

马勇做过古代史研究，做过儒家经学史研究，最终兴趣点却落在晚清70年。他一方面对此前的主流研究充满疑惑，一方面觉出现实与百年前的诸种关联，认为有必要从来路中寻出答案。

怀着一份对先人的温情与理解，他重新讲述 100年前的历史。

——《独立阅读》

内容简介：

《清亡启示录》讲述了一个王朝为何会在一百天的危机中走进历史。

历史无法遗憾，也不必惋惜，走过的就是走过了。只是一百年后回望大清王朝，特别是分析这个貌似强大的王朝为什么在一场危机面前不堪一击，这个过程究竟有哪些教训可以汲取？这是这本《清亡启示录》探究的问题。

2012是清帝退位的100周年，《清亡启示录》重点叙述分析了清朝最后十几年走过的路，从1894年开始的维新时代到1901年开始新政到之后的君主立宪预备，清廷挣扎着改革，以试图挽救风雨飘摇的大清帝国，然后最后清廷的几个失误使得所有的努力前功尽弃，最终使得大清走进历史。

《清亡启示录》

作者简介

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1894-1915：梦想与困惑》《超越革命与改良》《从戊戌维新到义和团（中国近代通史第四卷）》《1898年中国故事》《1900年尴尬记忆》《1911年中国大革命》《重读近代史：1898年那场未遂政变》《晚清二十年》等。

书籍目录

自序 IX

第一辑 新世纪新选择

改革为什么走向反面 ^ 003

清廷的觉醒 ^ 004

从君主专制到君主立宪 ^ 006

两个致命失误 ^ 008

从君宪到共和 ^ 011

几点启示 ^ 014

以改良反制革命 ^ 017

从维新到新政 ^ 018

“三个有利于” ^ 020

梁山好汉没有自愿的 ^ 022

那拨回归社会主流的人 ^ 025

一个激进青年的成长 ^ 026

革命逐渐陷入困境 ^ 028

回归主流 ^ 032

清末社会的官民冲突 ^ 035

反贪腐并不必然反体制 ^ 035

抑豪强与“养鱼政策” ^ 038

鸵鸟终将引爆动荡 ^ 039

第二辑 走向宪政

“有计划政治”：预备立宪日程 ^ 045

外交危机打乱立宪步伐 ^ 047

各方要求速开国会 ^ 048

朝廷同意提前正式立宪 ^ 051

“军机处不议”之智慧 ^ 053

政治改革争论的焦点 ^ 054

军机处存废之争 ^ 056

“五不议”换来政治改革空间 ^ 058

毁誉摄政王 ^ 061

一个不错的王爷 ^ 061

坚信“有计划政治” ^ 063

错误援引《钦定宪法大纲》 ^ 066

资政院的悲剧 ^ 069

非常态过渡机构 ^ 070

立法与行政的冲突 ^ 071

沦为鸡肋 ^ 075

第三辑 政治改革的限度

皇族内阁错在哪儿 ^ 079

清廷对立宪的让步 ^ 080

政治变动的恶性互动 ^ 081

皇族内阁暴露真面目 ^ 083

铁路国有的正当与失当 ^ 087

民间资本进铁路 ^ 089

官商合办到“国进民退” ^ 090

在四川跌了一个大跟头 ^ 092

为什么是新军 ^ 095

- 辛亥革命第一枪 ^ 095
- 从忠诚卫士到掘墓人 ^ 098
- “忠诚教育”是双刃剑 ^ 100
- 兵谏的政治诉求 ^ 103
- 新军起事两大动因 ^ 104
- 湖北军政府的政治底线 ^ 106
- 中央军致命一击 ^ 108
- 谁是君主立宪的受害者 ^ 111
- 君主立宪对谁有利 ^ 111
- 走向君主立宪 ^ 113
- 君主立宪不利于谁 ^ 115
- 第四辑 别了，皇上
- 当君宪成为往事 ^ 121
- 君宪先锋 ^ 122
- 君宪主义危机 ^ 124
- 君宪成为历史 ^ 126
- 别了，皇上 ^ 129
- 体制内抗争 ^ 129
- 最后的善意忠告 ^ 132
- 转向共和 ^ 134
- 皇族伤国 ^ 137
- 食利者阶层走向前台 ^ 138
- 政治变革急先锋 ^ 140
- 君宪了，皇族该干什么 ^ 142
- 共和关键 ^ 145
- 战争的最高境界 ^ 146
- 共和成了唯一出路 ^ 147
- “黄袍加身” ^ 150
- 君宪主义落幕 ^ 153
- 化危为机 ^ 154
- 希望似在前面 ^ 156
- 宪政终结 ^ 157
- 大清皇族今安在 ^ 161
- 溥仪和他的父亲 ^ 162
- 皇叔们 ^ 164
- 落地的凤凰 ^ 166
- 庆王爷和他的后代 ^ 167
- 穷困潦倒的镇国公载泽 ^ 169
- 川岛芳子和她的老爹 ^ 169
- 第五辑 晚清的意义
- 辛亥的意义 ^ 173
- 辛亥革命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 173
- 在什么意义上说辛亥革命是失败的 ^ 176
- 辛亥革命对后世中国的影响与启迪 ^ 179
- 晚清与民国：经济层面的比较 ^ 183
- 革命就是要解放生产力 ^ 184
- 革命一定能解放生产力 ^ 187
- 从孙中山到袁世凯：民初乱局的一个解释 ^ 193
- 谁的临时政府 ^ 194

《清亡启示录》

民国法统 ^ 198
尊重历史，善待前人 ^ 202
百年中国的进与退 ^ 207
清亡的启示 ^ 208
进与退 ^ 209
变与不变 ^ 210

章节摘录

梁山好汉没有自愿的清廷的立宪运动对海内外知识精英有着非常强烈的吸引力。按照梁漱溟的说法，他们坚信梁启超、康有为等人为中国问题所开的君主立宪处方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灵丹妙药，认为梁启超所提倡、鼓吹的国会制度、责任内阁、选举制度、预算制度、国库制度、审计制度，乃至银行、货币等问题，都是中国未来应该实行的优良制度，中国如果按照梁启超一班人的规划进行改革，就必然能够像西方国家一样，建设一个近代国家。君主立宪的稳步进行深刻影响了革命党，革命突然之间陷入空前低落。而且更厉害的是，清廷在稳定了国内局面之后，开始利用自己政治、外交上的优势，要求日本政府不要继续庇护孙中山等被中国政府通缉的要犯，因为这些政治流亡者一直试图用暴力推翻中国政府。日本政府庇护中国政治流亡者已有相当久远的历史了，日本人其实就是多边下注，现在中国政府既然改革了，那么就听从清廷一次建议吧，就将孙中山暂时请出日本吧。而且随着孙中山的出走，在日本创办的那些革命报纸也随之关门或受到严厉打压，章炳麟先前热热闹闹的《民报》也在这种情形下被日本人关闭，章炳麟还为此与孙中山等革命领袖闹了一场不小的意气，这为革命阵营内部的分裂埋下了伏笔。从人性的立场说，从来没有天生的革命家，所有的革命家都是被逼上梁山的，一旦形式转圜，可以改良，也真的改良，那些先前闹革命的其实很容易回归主流社会参与变革，在1906年之后，革命阵营发生急剧分化，章炳麟、苏曼殊等人眼见着革命无望，心灰意冷，托人找到张之洞等开明官僚，希望能提供一些资助，让他们西天取经，到印度当和尚、抄佛经。章炳麟、苏曼殊这样的做法还只是放弃革命，更厉害更极端的是刘师培、何震夫妇眼见得清廷立宪全面推进，眼见得革命无望，几近公开离开革命，加入两江总督端方的幕府。过去说他们就充当了清廷的鹰犬，其实今天看来，他们只是在国家形势趋缓之后回归主流放弃革命，甚至反革命而已。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宋教仁。宋教仁原本就是一个宪政主义者，他在清廷宣布立宪后，大约心中也有所感动，他在1908年前后竭尽心力写了一本《间岛问题》，主要是揭露日本人对中国东三省领土的觊觎。这本小册子写好后，宋教仁并不急于出版，而是托人转交给清廷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袁世凯。这无疑等于一纸投名状。袁世凯看了之后极为欣赏，托人传话希望宋教仁回来任职。宋教仁因故没有成行，但我们由此可以看到清廷立宪对革命的极大影响。在清廷立宪运动的影响下，革命几近彻底失望，只是清廷太不够意思的是，他们在立宪的同时没有宣布大赦天下，没有下令赦免孙中山、黄兴这些曾经武力犯禁的革命者。这势必留下这样的后果，不论出于生存还是其他什么原因，这些武力犯禁革命者只好继续犯禁，于是有徐锡麟、秋瑾这样的暗杀行动，有孙中山、黄兴不断策动的武装起义。这些行动虽说不能证明革命处于高涨状态，但对清廷的立宪无疑又具有一种倒逼的功能。革命与改良处在竞赛途中，究竟鹿死谁手，现在还真的很难说。当君宪成为往事两千年的君主专制曾给中国带来稳定和辉煌，但是进入近代以后，家天下的君主专制越来越不适应中国需要。1894年的甲午战争，1904年的日俄战争，前后不到十年，一个君主立宪的“小日本”相继打败中国与俄国两个巨大的君主专制国家。这个残酷事实不能不引起中国心灵上的巨大震动。走向君宪，成为那一代中国人的唯一政治选项。然而到了1911年，当君宪主义即将成为事实时，一个规模不大的军事哗变，竟然在一夜之间掀翻了一个具有两百多年历史的庞大帝国。这其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是必然还是偶然？一百年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实，我们可以听听老牌君宪主义者严复的分析，他的那些独特看法没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对于清廷、袁世凯、革命党、康有为等，均有批评有分析，相对说来比较中立客观。君宪先锋在近代中国，严复是作为思想启蒙者载入史册的。他在甲午战争后向中国人翻译介绍《天演论》，从理论上为先前几十年只重视物质增长的“中体西用”背书，以为中国所面对的问题就是在经济形态上落后于西方，中国最迫切的问题就是经济增长和社会体制变革。至于其他比如政治架构，严复在那个时代并不认为已成为中国发展的障碍，成为非常迫切的问题。基于这样的认识，严复在1895年之后的维新运动中虽然积极介入，也传播了许多西方新思想，但是严复好像并不能认同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的许多观点，我们从他那篇著名的《拟上皇帝万言书》中，发现其主张就是一种君主主导下的政治渐变。只要变化的方向对，就不要操之过急，耐心地走下去，终归能够走上东西洋立宪各国共同的路。中国不要标新立异超常规发展，总显得急不可耐、步履匆匆，一个政治上成熟的大国就要显现从容优雅的风度。对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1898年的急切，严复向来不以为然，以为正是这对师徒的乱来，最终葬送了大清两百多年的江山。严复当年设想的是，假如康有为、梁启超不去鼓励那个少年天子匆匆忙忙进行政治变革，而是两宫和睦渐进改良，那么要不了多少时间，大清的政体必能有所改善，等到慈禧太后百年，等到小皇帝再成熟一点，许多问题应该不会继续成为问题，应该能够迎刃而解。严复的

《清亡启示录》

思考当然不是事实，1898年之后的中国在经历了几年彷徨徘徊后，终于在1901年重回新政轨道。特别是到了1904年，中国在经历了日俄战争的强烈刺激后，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宪政，中国从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转型的过程正式开启。这是中国政治的实质性进步，因而严复和那时主流社会的人们一样，很快从1898年之后的政治冷漠转为政治热情，迅速转变成一个君宪主义者，真诚相信君主立宪是当时中国政治上的唯一出路。对于清廷的君宪主义呼吁，严复给予积极的回应，并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君宪主义运动提供理论支援和学理依据。他在那一年（1905年）先后数次在上海青年会演讲西方政治学，对世界上已有和现存的国家类型给予细致点评，以为要救亡，就必须将中国从君主专制改为君主立宪，因为只有立宪体制下，民众才能通过议院轻而易举地完成和平变革，实现政府更迭而不危害皇室利益，皇室也就可以在君主立宪体制下万世一系，永享国祚。君宪主义危机严复对君宪主义有很高期待，以为在当时中国历史文化背景下，君宪主义是唯一出路，君宪主义可以将中国从孤立状态中拯救出来，君宪主义也是世界潮流，然而君宪主义的内涵究竟是什么，严复的理解与思想界主流，与清廷的举措似乎有同有异，并不完全一致。严复指出，君宪主义并不只是政治架构的改革，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君宪主义落到实处，就是要提升教育，普及教育，陶铸国民，改革司法，最大限度防止革命的发生，防止暴力冲突。对于满汉冲突，严复始终认为是革命党人在理论上的一个虚构，并不是历史的或现实的真实。孙中山和革命党人所鼓吹的什么民族主义，其实只是一种狭隘的种族主义，这种主义不仅无法拯救中国，反而会将中国拖到一个无底的深渊。严复强调，中国国情确实具有不一样的地方，如果听任一些革命党人的种族主义敌对情绪走向极端的话，那么不仅当政的满洲人没有办法抵抗，甚至毫无防卫的力量，即便是蒙古、新疆、西藏等周边族群都很难找到自己的归宿，他们无法与纯粹的汉人一道组织一个广袤的无法驾驭的共和国，因为这里有种族仇视仇杀以及感情、习俗、宗教乃至法律上的差异与障碍。当中国不得不进入共和国时，周边族群的可能出路就是将广袤地域和众多人民转投某一大国而独立。这种事情一旦发生，“分裂中国”的老问题就来了。这就不是中国的出路，而是中国的灾难，是中国的毁灭。所以严复始终如一坚定反对革命，反对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宣传，以为只有君主立宪可以维系中国这个多族群多种族的国家。不幸的是，中国政治发展就沿着严复预言的反方向发展，革命成了重要选项，甚至一度成为重要选项。对于这一点，严复并没有刻意攻击革命党和孙中山，他认为君宪主义危机发生和排满主义强盛，其主要根源在于满洲贵族的无能和自私。根据严复的分析，君宪主义之所以在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不久陷入危机，之所以发生武昌起义和全国范围响应，主要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是因为摄政王及其大臣的极端无能；第二是因为心怀不满的新闻记者们给中国老百姓的头脑中带来了无数偏见和误解；第三是因为秘密会党和在日本的反叛学生酝酿已久；第四是因为在那之前几年间长江流域饥荒频仍，以及商业危机引起的恐慌和各个口岸的信贷紧缩。在严复所分析的因素中，最重要的在他看来就是第一条，是摄政王及其大臣的自私和无能。严复指出，清廷在十多年前接受德国和日本人的建议组建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是对的，将权力尽可能地收归皇室收归中央也不算太错，只是满洲王公在做这两件事情时没有从国家根本利益进行考量，而是带有非常自私的倾向。政府以三分之一的收入改编军队，不是将这支军队改造成国防军，而是弄成了皇室私家卫队，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将壮丽的城堡建筑在磐石之上。摄政王自封为大元帅，让他的一个兄弟统帅陆军，让另一个弟弟统帅海军，摄政王天真地以为这样至少不愁没有办法对付那些汉族的叛逆子民。摄政王做梦也没有想到恰是倚仗的东西有朝一日会转而猛烈地反对他，因为他不知道所倚仗的东西的根基已被数百个新闻记者的革命宣传瓦解了。君宪成为历史根据严复的分析，君宪主义在中国成功的机会是巨大的，但是倒霉的盛宣怀和他的铁路干线国有化政策为各地不满的民众抗议政府提供了口实和机会。要是朝廷知道如何对付四川人民，事情或许会好办些。而清廷除了懦弱、自相矛盾外无所作为，结果导致四川暴乱。革命党人那时在为各省咨议局的联合而工作，并在新军中加强了活动，于是武昌失守，军人哗变。军人的介入使问题的处理困难百倍。前往武昌镇压哗变的新军敢于第一次起而抗争，宣称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暗示自己与南方新军是同种同族，甚至北方的军队也杀机毕露，发动兵谏，种族主义简直就像一个法力无边的魔王，霎时间将悉心经营两百多年的帝国推向绝境。在军队的压制下，清廷被迫退让，于10月30日下诏罪己，发誓要永远忠于服从即将召集的国会，发誓不让任何皇室成员进入内阁；宣布对所有政治犯甚至那些反对皇上的革命者实行大赦；宪法由议会制订，并将被无条件接受。这三条宣布太重要了，但是确实晚了。严复非常遗憾也非常痛心表示，如果一个月前做到这三条中任何一条的话，中国的历史都不会这样发展下去，清帝国依然会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王朝。然而历史现象往往重演。这和十八世纪末路易十六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所有这些都太迟了，没有明显效果。所谓宪法十九信条在严复看来根本不是宪法，这不过

《清亡启示录》

是将专制政权从皇帝手里转移到国会，根本无法给中国带来持久稳固，因而不是进步。对于清廷空前的政治危机，作为资政院钦选议员，严复忧心忡忡，但对中国由此变为共和政体，则无论如何不愿认同。严复的担心只有两点，一是中国国民程度不具备，中国要想走上共和道路，至少需要三十年的积累和训练；二是中国如果由此强行进入共和，必将引发新一轮边疆危机，且种族之恨相为报复，必将贻害全体中国人。基于这样的认识，严复在袁世凯出山之后竭诚帮助清廷化解危机，以随团代表身份前往武昌、上海参加南北议和，劝说黎元洪和南方革命党人重回君主立宪道路，反复解释只有君宪主义才能从根本上为中国开辟一个新时代。严复的劝说在一段时间起到了相当作用，黎元洪和武昌革命党人确实在会晤时表示可以考虑重回君宪体制，只是要求清廷必须彻底改革，不能再耍什么新花样假招子。对于这一点，严复也感同身受，以为重回君宪主义的前提当然是清廷彻底改革悔过自新。他对清廷的建议是，根据文明进化论规律，最好的情况是建立一个比目前高一等的政府，即保留帝制，但受适当的宪法约束。应尽量使这种结构比过去更灵活，使之能适应环境，发展进步。可以废黜摄政王；如果有利的话，可以迫使幼帝逊位，而遴选一个成年的皇室成员接替他的位置。形势逼人强。当严复提出这些建议不久，南北各方达成和解协议，清帝退位，优待皇室，五族共和，由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这一切虽然不是严复的理想，不是他的君宪原则。但事已至此，这些妥协似乎也是一个可以接受的选项，因而没过多久，严复欣然接受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的任命，接管京师大学堂，毫无眷恋地抛弃君宪主义，坦然进入一个全新时代。别了，皇上只是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这个计划被耽搁，直至20世纪初新政再启，君主立宪重回中国人的视野，也由此涌现出一批职业政治家。他们在后来的政治变动尤其是从立宪向共和的转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南通张謇就是影响最大者。体制内抗争张謇曾经对日本的君主立宪长期保持关注。日俄战争开打后，他敏锐意识到日本将战胜俄国，胜败的关键不在国土、人口、兵力，而在体制。日本的立宪体制使其致力于实业教育30年，因此有足够的力量与中国、俄国抗衡。不久之后，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取胜，的确证实了张謇的预见。与此同时，体制内的驻外使节如孙宝琦、胡惟德、张德彝及一些督抚朝臣纷纷转变立场，认为只有立宪可以防止中国重蹈俄国覆辙。有以他们为代表的立宪派与朝野上下寻求变革的力量推动，更因为在家天下时代，对于朝廷有利的事情，朝廷都会欣然接受，经过一番讨论和考察后，清廷于1906年秋天郑重宣布预备立宪，争取用九年时间将中国带上日本那样的立宪国家道路。所谓九年准备其实正表明了一种郑重其事的态度。清廷希望在确定方向之后脚踏实地、稳步进行，推行“有计划政治”：先推动官制改革，再参照东西洋各国重定法律，接着大兴教育，清理财政，整顿武备。按照当时清政府的规划，经过这些稳扎稳打的筹备后，立宪大业自然会水到渠成。对于清廷的稳重方案，焦急的立宪党人当然有点不太愿意接受，他们急切期待用立宪摆脱危机，富国强兵。在清廷预备立宪御旨颁布不久，张謇与汤寿潜、郑孝胥等立宪党人积极活动起来，力促清廷加快立宪步伐。经过反复计议，他们联络江浙闽粤等地近300名立宪党人在上海创办“预备立宪公会”，出版报刊，宣传宪政；编纂商法和公司法，以保护商人利益，促进工商业健康发展；开办法政讲习所，培养立宪人才。经过这些筹备，预备立宪公会又联络其他政治团体，尝试举行请愿运动，以早日将中国带上立宪轨道。张謇和预备立宪公会的领导人确实具有相当能量，他们很快联络全国各地相关团体十多个一起向朝廷施压。面对如此压力，清廷也作出了一些善意回应，一再重申立宪方向不变，并同意在中央创设资政院，在各省创设咨议局。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各省咨议局和中央资政院为立宪党人的活动提供了合法平台，张謇等人利用这个平台做了大量工作，短短几年，立宪思想逐渐深入人心，各省督抚在咨议局的咨询、问责下，渐渐觉得不太舒服，甚至有点“官不聊生”的感觉。从立宪党人的立场说，咨议局并不是一个完全议会，只是一个议政机构，并不具有立法资格。各省议员在经过一段时间实践后，也感到这种准议会性质不利于宪政推行，因此他们格外期待朝廷能够速开国会，组织责任政府。这就是国会请愿运动的来历。张謇等人发动的国会请愿运动是一种体制内抗争，在认同体制的前提下建议加速改革。这些建议虽有违于朝廷的“有计划政治”，但其心可嘉，经过几番争取奋争后，朝廷还是在第三次请愿发生时作出提前召集国会组织责任内阁的承诺，决定在1913年召集正式国会，在此之前先将官制厘定，并预行组织内阁。最后的善意忠告此次清廷对九年预备立宪的调整是真诚的，只是在人们接受了这一调整方案，静候按部就班厘定官制，特别是预行组织内阁时，却出了大问题。1911年5月8日，清廷宣布第一届责任内阁名单，13位阁员中竟有9人为皇室或皇族，这无异于军机处的亲贵内阁。皇族内阁一出台，立刻引起立宪党人的普遍反对，张謇也在第一时间敏感意识到清廷的这一举措不仅违反祖制，而且处理得不好，势必导致人心皆失，一场巨大的政治动荡将不可避免。君主立宪是张謇那一代中国人苦苦探究十多年的结果，也是那一代中国人认为最合乎中国的道路，君主专制既然已成历史，民主

《清亡启示录》

立宪又不想要，只有君主立宪这条路。现在君主立宪弄成这个样子，满洲贵族对权力的垄断已经变得疯狂而肆无忌惮，这不能不使以张謇为代表的老立宪党人异常愤怒。愤怒归愤怒，出于大局考虑，张謇并未就此与清廷翻脸。而且，传统的君臣观念也影响着他，他只能忍气吞声，有话悄悄向皇上说。张謇为此联系汤寿潜、沈曾植、赵凤昌等人联名致信摄政王，旁征博引耐心劝告摄政王仿照咸同年间成例，重用汉大臣中有学问有阅历者，无论如何不能以国家为赌注，放任皇族和“高干子弟”胡作非为，因为如此垄断权力，必将丧失人心。危急时刻，张謇还协同友人前往武汉拜访湖广总督瑞；再至彰德，拜访20多年未见面的袁世凯，详细交换对时局的看法。紧接着，张謇一行入京，与载泽、载洵、载涛、徐世昌、唐绍仪等政要频繁接触，并获摄政王接见。也就是在这次接见中，张謇向摄政王提出了“最后的忠告”，以为当时的外交有三大危险，内政有三大要事。外交上的三大危险，一是《中俄伊犁条约》；二是宣统五年《英日同盟条约》期满；三是美巴拿马运河告成，必有变故。至于内政三事，一是外省灾患叠见，民生困苦，朝廷须知民隐及咨议局事；二是商业困难，朝廷须设法振作；三是中美人民联合。张謇面见摄政王时，出于稳妥，虽然对其有所忠告，但回避了最敏感的体制改革，尤其是皇族内阁、铁路国有等问题，选择了在随后与王室成员的交谈中再明白阐释自己的看法。对四川风起云涌的保路运动，张謇表示同情，建议载泽尽快与盛宣怀商量，调整方略，无论如何也要将那些集资修路的川民从这个政策的损失中剥离出来，不应该让他们承担政策的损失。他提议用中央财政将川民的集资款退回，然后集中力量追查川汉铁路公司及那些官绅的责任。在多番努力未见成效后，张謇看到事已至此，所能做的只有为皇族内阁建言。在京期间，他没有过多就皇族内阁发表看法，等8月回到南方后，很快发表《请新内阁发表政见书》，在不反对皇族内阁前提下，提出三点建议：一是速发内阁新政见以刷新中外耳目；二是实行阁部会议加强中央各部门之间的沟通；三是建议国务大臣恢复幕府制度，选择优秀人才进入幕府议政。转向共和很显然，张謇这样的立宪党人对皇族内阁和铁路国有的反对，还是比较温和而有节制的。他似乎倾向于相信，大清王朝面对这样的政治危机应该能够化解，秩序应该能够得到恢复，毕竟这是一个200多年的王朝，经历过那么多大风大浪，应当不会在这风浪中翻船。因此，即便武汉因成都保路风潮弄得一片恐慌，张謇还是在10月初到那里主持了一个纺纱厂的开业仪式。10月10日晚8时，忙碌多天的张謇登上“襄阳丸”号顺流东下，突然看见武昌草湖门一带起了大火。想起昨天曾有革命党人被查获处死，他估计这火灾或许是闹事者余党报复。船行20里外犹见火光，此时的张謇怎么也想不到他目睹的是那场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件。那些大火就是湖北新军愤怒的火焰，他们不是为昨日被杀者复仇，而是发动了起义，是辛亥革命的开端。作为立宪党领袖，张謇对革命本能地厌恶。两天后（12日）抵达南京，张謇第一件事就是劝说江宁将军铁良出兵援鄂平息动乱，并请铁良代奏朝廷立即实行立宪，改组内阁，平息国人愤怒。张謇真诚希望社会稳定，不喜欢革命，为可能造成的社会动荡忧心忡忡。他在此后几天分别拜会两江总督张人俊、江苏巡抚程德全，对他们苦苦劝说，在得到程德全认可后，与雷奋等人代程德全及山东巡抚孙宝琦起草了一份奏折，请求朝廷立即改组内阁宣布立宪，标本兼治，剿抚并用，并建议对酿乱首祸盛宣怀严加惩处以谢天下，筹组责任内阁代皇上负起责任。革命的发展超出了所有人预料。短短几天，湖北独立、湖南独立、山西独立、陕西独立、江西独立、云南独立，这股独立风潮像传染病一样传到江浙，传到上海，张謇等立宪党人坐立不安，却又无可奈何。他的立宪同志李平书出任光复后的沪军都督府民政长，他的亲信沈恩孚、黄炎培也到光复后的江苏都督府任职。许多地方平稳光复，和平过渡，使张謇对革命的恐惧大为减轻，他的思想也就在这时发生转变。张謇意识到，革命既然已成为大势，谁也没有办法阻止，立宪与革命虽说有很大差异，但在目前形势下，立宪党人有责任与革命党保持合作，稳定社会，控制局面。11月8日，张謇致信江宁将军铁良和两江总督张人俊，劝他们在动荡时期好自为之，千万不要让满汉战士兵戎相见，应该引导大家在共和主义理念指引下友好相处。这大约是张謇转向共和的最早证据。和平光复势不可挡，自武昌首义至张謇致信铁良等人不过32天，独立省份就已有14个。这14个独立省份当然并不都与朝廷严整对立，但清廷的政治危机至此已暴露无遗。先前十几年的立宪奋斗终于因清廷内部自私、不妥协而被彻底葬送，转向共和转向革命，也就成了张謇这批立宪党人无奈却必然的选择。11月23日，张謇在上海会同汤寿潜、熊希龄、赵凤昌等老立宪党人联名致电张家口商会转内外蒙古赞成共和。接着，张謇又与伍廷芳、唐文治联名致电摄政王，再进忠言，以为非共和无以生灵之涂炭，保满汉之和平。君主立宪已成过去，为皇上为王爷计，此时若幡然改悟，共赞共和，以世界文明公理待国民，国民必能以安富尊荣之礼报皇室。别了，皇上。这是中国人，也是张謇一个痛苦而又不能不作出的选择。

《清亡启示录》

《清亡启示录》

媒体关注与评论

马勇做过古代史研究，做过儒家经学史研究，最终兴趣点却落在晚清70年。他一方面对此前的主流研究充满疑惑，一方面觉出现实与百年前的种种关联，认为有必要从来路中寻出答案。怀着一份对先人的温情与理解，他重新讲述100年前的历史。——《独立阅读》

《清亡启示录》

编辑推荐

《清亡启示录》编辑推荐：百年前的一百天，如何导致一个王朝的灭亡？身处变局的各色人物，又如何决定了中国此后的走向？那被妖魔化的晚清十年，真面目究竟为何？更重要的是，这个危机启示了什么？

精彩短评

- 1、从另外的角度详细介绍了晚清史
- 2、不好，功力不够
- 3、皮毛
- 4、对清末有了全新的认识。
- 5、“大清国是通过暴力构建的帝国，这样的帝国无论怎样改革，都无法变成一个良性的体制。一个特殊利益集团垄断权利和一切资源的帝国，其最理想的出路就是和平退出，让人民拥有权力，重新建构属于人民的现代民族国家。这就或许是清之所以亡且不得不亡的根本原因。”
- 6、2/60看过张鸣《辛亥：摇晃的中国》的后再看此书，对清朝的灭亡有更深一步理解，大清确实不是别人葬送了它的王朝，而是自己清王朝的那些贵族爱新觉罗氏葬送了自己，太怜惜既得利益而导致短视，舒服得太久而没有了危机感，太偏安一隅而忽视了世界潮流，闭关锁国自怨自大总不行的，一句简单的话，“不怕你本事大（自以为本事大），就怕拉出来比”。但整体来看，结束君主专制是必然，就算清王朝识时务做些改良，体制也忍受自己的剧痛承受，但是在世界潮流下，结束专制只是时间问题，但如果真的改良成功中国以后的道路怎么走还真不好说！
- 7、比看《辛亥革命》电视剧要认识得更深刻，毕竟是名家名作！
- 8、不错的书，非常客观公允
- 9、关于清朝的灭亡，官方的历史课本上给人的感觉是必然的，是那种一呼百应的革命结果。而这本书给人的感觉却是清朝的灭亡是意外之举。如果没有立宪派的倒戈，或许革命党人不会成功。而立宪派倒戈下的革命，并非是革命党人想像中的革命结果。后继的历次护法行为，也是由此而起。由100年前想想今天，或许有些相似。
--
打破容易，建设困难。
尊重历史，善待前人。
- 10、几乎所有的书里都给辛亥革命那一枪赋予了各种积极意义。可是，如果作者分析无误，那么，武昌的夜半枪声本不是那么回事，甚至，本与革命无关。要怪只能怪光绪和慈禧死的太早。如果能再晚走那么两年，今日之中国，只怕已是如英国和日本那般的君主立宪国家。可惜，历史本就是许多的偶然事件造就的，充满了变数。
- 11、启蒙小书？整本书应该是专栏合集吧，内容观点反复重复太恶心了，马老师的水平还是挺高的，通过锵锵三人行知道的马老师，马老师的政治天真真可爱可敬。
- 12、财新新世纪专栏集结成书，可读，然各篇重复部分甚多，同一套话说来说去，又都缺乏深入阐述，欠系统性。
- 13、是本好书，有很多新的观点，改变了我对那段历史的一些看法。但是内容上有很多重复，感觉整体性不太好，而且原始史料少，大多是作者的叙述，算是第二手材料。
- 14、今年是清帝退位100周年，这本书主要写清王朝在100天的危机中走进历史的教训和启示，清王朝是一个很值得总结和借鉴的王朝，他的发展过程和兴衰对我们的今天仍有启示作用，历史是需要我们经常去反思的。
- 15、不好看
- 16、不一样的时代，差不多的故事
- 17、感觉文章间有许多重复之处，不是很满意。
- 18、认识到精英政治
- 19、核心是培养政治的现实感。几个地方很有意思：1.“改良对革命的反制”（包括对刘师培经历的描述）：1894年马关条约后革命抬头，辛丑再加剧。1904年日俄战争意识到君主立宪的必要性，五大臣出访，吴樾自杀式袭击。意识到改良是对革命的反制。对应的人物命运是章太炎和刘师培的经历。2.新政和官民冲突的内在联系（制度成本问题，新政推行过程中的地方利益吞食）：新政必然对应新举措，新举措要钱，这就是新政的制度成本。
- 20、有点想法 但太啰嗦
- 21、看过kindle版本，再买来收着，非常好的一本书。。

《清亡启示录》

- 22、点出了辛亥革命中的核心问题：主流立宪党人与支流革命党人两条路线的区分。对清廷的分析却透着幼稚的书生气。
- 23、作者稍微有一点点啰嗦，相同的事情在不同的篇章中重复略多。对于晚清的政治改革，立宪的成绩作者还是大都肯定的。这样的肯定恰好能够说明改革的不彻底，利益集团对于权力的垄断葬送了一切。一切以历史为鉴，其实就是在谈我们现在怎么办？
- 24、作者把清亡归纳为两点技术性失误，一是皇族内阁，二是铁路公有化。
- 25、讲的很不错，很客观，这样的书不多了。
- 26、很好很快很便宜
- 27、水平功力感觉不如雪珥
- 28、颇有些借古讽今的春秋笔法的感觉，分析问题大处着眼，小处着手，难得的近代史分析好书。
- 29、探讨清王朝灭亡的著作太多，一句话，腐败无能的清王朝早就该亡。
- 30、清末的那段乱糟糟的历史，作者写来清清爽爽。处处都可以看到今天与那时是何其相似！甚至当前的一些风云人物都能和那时的人对上号。所以理解了“启示”的含义。不过也太像了吧？
- 31、喜欢历史。。。
- 32、不一样的观点，推荐阅读
- 33、读起来如隔靴搔痒
- 34、3星也可，有重复。。。
- 35、马勇的书，作为通俗读物还不错，但缺乏深度和新角度和视野
- 36、作者把自己的意图，放到了最后的一段话了。
- 37、质量很棒，抓紧读读
- 38、本书篇幅短，言简意赅，把事情描写的非常清楚。
- 39、清亡启示录一个王朝在一百天的危机中走进历史，以史明鉴
- 40、从经济史的角度看待辛亥革命是亮点
- 41、1、一家之言，如果纯粹以史论史，应该说可以开阔你的思想，让你多个视角看那段历史！但作者对那段历史中的些许关键人物如隆裕皇太后、醇亲王载沣等多有和其他史家不同的描述，不能不让人有是不是想当然的成份在里面。史家写史，毕竟可含深情但要直书，多些史实而少些想当然吧？...
阅读更多
- 42、为了解释执政党政权的合理性，历史书上的近代史显得简单、粗暴。但是翻开马勇先生的<清亡启示录>，我发现历史其实是复杂又充满偶然性的。作者语言冷静、克制，带我们绕到官方历史的对面，一层层剥开现象的外衣，梳理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是对官方历史一个很重要的补充。
- 43、马勇的书很值得一读
- 44、非常好的一本书，能让人收获得课本中没有的思考。
- 45、马勇的书肯定是要推荐的，尽管最近出版的几本书有部分重复的地方。读他的书，故事性很强，各个篇章一环套一环，从清末王朝筹备立宪结束封建；到立宪进程因故终止；再到革命党人和军阀各派系的联合推翻朝廷，预备走民主共和之路；再到建立临时民国政府，思路脉络清晰，其中还涉及到几位受到大时代影响下的朝廷之人；革命党人；支持君主立宪之人，每个人物命运多舛。
- 46、我直接跳着看的，然后再重头看。原来落在了启示现今社会的改革步伐上。非常值得收藏和一看的好书，不仅仅对如今的民主化改革有益处，对读懂国家政策亦有帮助
- 47、书的质量不错，纸张好，内容可以
- 48、当当网搞活动时候买的，已经存在藏书夹里好久了，只是现在想看的书很多，但囊中羞涩，只能趁活动期间抓紧买了，书应该不错吧。
- 49、清末民初历史的另一种解读。部分叙述前后反复，差强人意；但就我自己而言，这本书提供的视角具有超越这本书本身的意义。结尾的启示部分从某种角度上看稍显蜻蜓点水，虽然也可以说是切合当今。一段与当今的中国无法割断的历史，让人重新燃起对清史和近代史的兴趣。
- 50、缺点是不够严谨，引用史料均未有出处详细说明。优点，确实是一本有解读的历史书，当年读书时我就觉得奇怪清朝从没落走到灭亡也有几十年，这几十年他们在做什么？这本书里给出了自己的答案。特别是最后对革命的成功失败的分析以及孙中山同志的定位还是比较有自己想法的。是一本不典型的历史书，但是值得一度，确实是启示录。
- 51、成王败寇，走向共和

《清亡启示录》

- 52、历史书...
- 53、好的，好的，好的，
- 54、真实的东西总是吸引人的，有道理的。教科书式的空洞才会让人感觉莫名其妙的拒绝接受的失败，更不要提什么以史为鉴的深远意义了。
- 55、大清帝国的倒塌完全是一个偶然。
- 56、不是那么深入的讲解历史。更多地是告诉我们他个人的看法，但是又没有给出相关的例证来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这个历史。
- 57、重新认识晚清最后十年
- 58、确是替皇上可惜。
- 59、挺好的，除了车轱辘话比较多以外
- 60、刚送到还没有打开，看外边包装的挺好，内容不会差到哪里去!
- 61、读了这本书，可以感觉到作者那温和的包容的历史感，对历史的评价总是那么的有人味，把历史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去评价，提出了跟教科书很不一样的观点。
- 62、没有如果。有个问题，最高领导人的思维转换为何如此之快？之前有铺垫？作者貌似没说。像是有罪推定。
- 63、个人觉得这本书写的很精，而且内容不算是冗长乏味的那种，值得一读
- 64、颇负盛名，不负众望
- 65、这本书是在老师的推荐下买的，我大概浏览了一下，文字、图片结合得不错，这样读起来不会很枯燥。不过寄过来的书已经拆封了，我更偏爱包装完整的新书。
- 66、很不错的，观点和分析很到位，值得好好看
- 67、辛亥百年，不光要反思革命成果，也要反思清亡教训。百年反思，常思常新，当下遇到新问题时我们更要回想清末。
- 68、失民心者必定失天下！腐败政府可引以为鉴！
- 69、读起来有点费力，君主立宪来来回回说了好多，期待更多历史实纪，可作者个人观点太多。
- 70、写的还算不错。支持作者的立场。清末民初的那段历史，需要公正客观的去回顾，而不是象教科书里那样。以史为镜，可知未来。
- 71、正在看这本书。打动我买这本书的有两点：1、对历史的温情态度，2、换种历史观了解清末这段历史。
- 72、爆了国民党的黑幕，中山先生没有那么伟大，袁公非窃取革命果实，清廷也没有那么不堪。反过来，有点怀疑现在。
- 73、此书不错，对晚清革新有不同的认识，跳出了清政府不改革、假改革的套路，对晚清新政有新的认识。思路具有很强的启发性。
- 74、书的内容不错，但的确是浪费纸张，其实薄一点也可
- 75、清亡启示录
- 76、暑假闲书第二蛋。
- 77、一个王朝在一百天的危机中走进历史
- 78、分板块叙述使得架构清晰，但不同版块内容有赘述。
- 79、看完此书，颇有点扼腕，其实满族的当权者视乎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保守，推动所谓君主立宪，也有极为进步的一面，但是奈何无法放弃自己手中的权力，终究无法阻挡历史潮流，成为前朝遗老。
- 80、有新意，有启发意义。
- 81、no so worthwhile
- 82、还不错，朋友推荐的。
- 83、一个朋友推荐的，看了不错
- 84、所谓预备立宪的“九年计划”最终被清廷搞成了拖延症，还顺带把自己拖挂了。现在看来，我朝政府在重大问题如民族、领土、选举上皆有晚清遗风。什么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简直是得其神形。历史教科书上不到五页的一段历史兼具的可能性和多样性拿出来书写是难能可贵的，尤其是在执政党在叙述其走向共和、法制、民主时一再强调其法统与历史合法性的历史背景下。
- 85、听闻已久长知识的一本书
- 86、作者切入的角度很有意思，對君主立憲和民主共和兩派的消長競合寫的尤為仔細，確實有值得思

《清亡启示录》

考和繼續鑽研的空間。只是作者在幾個推衍的關鍵處，含糊帶過是極嚴重的敗筆。課本都說慈禧欺負光緒到夠噲，作者說慈禧、光緒都是政治強人，確不肯多花一點點墨水說明為什麼認為光緒是強人，好像這是所有人都該知道的常識。

87、获益匪浅 觉得以前的观念太孤陋了 还受误导了

88、没有一味停留在历史的表面，有些带有主观色彩的观点很大胆，但有理有据。

89、這周看完了馬勇的《坦然面對歷史的傷》、《清亡启示录》。前者溫情的敘述晚清的重大史實，是一本很好的近代史入門書。後者分析晚清滅亡、改革失敗的原因和歷史教訓。我們對先人要懷有一份溫情與敬意，他們的德行為你難以望其項背，他們的智慧也為你望塵莫及，不是你可以妄自猜度和加以揶揄的。

90、假如真的君主立宪了 君主权利木有了 可能对于君主来说还不如直接共和算了...

91、看评论买的。不过感觉不是启示录，倒像是糊涂录。不推荐

92、这才是一个史学家应该写出的东西。历史是符合常理和常识的。乱世中没有专门损人不利己的教科书历史。

93、依然马勇

94、帮朋友购买的，朋友非常满意，托我买了2本呢。

95、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

96、马老师也算名家了，文笔流畅，见解新颖。

97、不错的一本书，帮老板买的

98、“清亡启示录”这标题太大了，其实是“旧制度与大革命之清季君宪改制考”。

99、有矫枉过正之嫌。制宪立宪想法固然好，诚心可疑。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绝非想象中稳妥渐进的改良可以应对。判断没有问题，袁世凯以及一大批遗老遗少试图维护帝国版图的完整统一，却始终难以应对革命暴动和思想共识上的混乱。重塑现代民族国家共识，对于中国，太困难

100、对古人的理解与宽容

101、清末是不错的，如果不那么激进中国应该会更好

1、钱穆曾言，对历史应怀有一种温情与敬意。马勇教授的尝试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份情怀。其实革命一开始不是社会的主流，智识之士多以立宪改革作为推动目标，而清廷起初的新政与立宪尝试也赢得国内外的普遍支持，革命一度陷于低潮。但随后清廷却因两个“致命失误”（皇族内阁与铁路国有化）葬送法统。而袁世凯是当时众望所归的法统继承者，南京临时政府只是南北和谈后的过渡产物。这样的讲述，让我看到了那个时代温情合理的一面。可能历史上从未出现一以贯之的善与恶，也并非革命史描述的那般大开大合。当我们以温情与敬意回望民族的过往，它也将呈现合理的一面。这种对待历史的态度，可令我更为宽容地看待当下的社会，更加善意地对待他人。

2、清朝是离我们最近的一个封建王朝，也许再早些，我们这样的80后都可以触及她的幻影残留，更多的习俗还是不是地影响着我们，正因如此，学者研究封建社会形态往往都以清朝为切入，大量的文书资料都有助于勾勒出当时的情形。晚清国家动荡当然不是短短几句话是可以解释社会的最更本矛盾的。曾经在外族口中的中原地区，基本是以汉族为中心所发展起来的，由于气候地理等自然因素所造就的环境，使得汉族在这块土地上生机勃勃，不仅农工商业发达，甚至文化也是影响广泛。对于中原周边的外族而言，生存基本要素得以解决后，在没有深层文化底蕴作为基础的情况下，发展军事侵略他族领地想象中是一个很好的上层建筑。当领地和人口一再扩张后，就演变成为了政治而不再是村落或是部落了，群体的发展要么继续扩张下去，要么就自我蚕食，迅速消亡。当满族入主中原，消灭了最大隐患吴三桂后就开始趋于稳定，但社会的某些角落里还依然喊着反清复明，但已经不足以对当时的政权形成危害，因为那时的皇帝不是个不作为的主，他的扩张已经从领土和人口上升到了文化中，结果就是乾隆时期的繁荣和晚清的扶清灭洋，时间让汉族和周边民族得以融为一体。既然如此那为何晚清的10年却是那么凄惨呢，团结一致，众志成城维护大清江山不是理所当然吗？不然。当我们看代群体的时候不该缺少人性的成分，当群体越来越大的时候，主要领导者们的个性是决定成败的一大原因，这其中包含了自信，自私，固执等等，有些都看似负面的，但不同场合却是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光绪皇帝想用君主立宪来更替君主专制，可慈禧只顾自己的利益有无受损，当知道预期后果后气到弄死光绪。对慈禧来说一个就是民族主义，不论革命的结果，大清就是不能终于自己手里，或者说不能终于跟自己有关，毕竟光绪的选定是她的决定，否则她将受到同族的谩骂，受罪于亡国之名，另一个是背叛，扶植光绪，但他却给慈禧下圈，对她而言是不可饶恕的，欺君也好亲情也罢，都可以作为理由，自私自利最终葬送了她俩和大清。反观孙中山，领导革命军推翻大清，但17年的国外流浪，没有一次直接领导起义，是不是有点不可想象？枪林弹雨下革命军官兵冲锋陷阵，自己享受着成功果实，正因为这样才有英雄的感觉，才有号召的魅力，不是吗？在书中看到了最为平淡的描述，这些也是最为震撼的。当群体没有向心力的时候，大都出现了各自为阵，高层不曾想着如何再捏一把，而是过多的不作为，放任各地军阀。清廷也是无计可施，国库告急只能再次压榨民间资本，失信于民，原本的改革路线只得变更为被革命路线。晚清10年，内忧外患，名曰《启示录》，真是值得我们思考。

3、杨泽斐：一场埋葬清王朝的改革 在中国近代史的叙述中，清末总是被描绘成一幅末世景象：庚子赔款之后，西太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暴露出清王朝洋奴的嘴脸，民生凋敝，百业萧条、政治腐败，内外交困，似乎只有革命这剂猛药才能让中国这头沉睡已久的狮子恢复健康肌体。这是传统近代政治史对晚清的叙述，然而在马勇教授《清亡启示录》中，晚清最后十年的历史不再是一味腐败卖国，晚清在政治上改革立宪，实施新政的努力值得正面肯定，不能以一种革命者对待清王朝那样的姿态弃之如履。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英国资本主义体制凭借其巨大的制度效率迫使世界体系的后来者学习这一制度。因此与原生型的现代化模式不同，中国在被迫拖入世界体系之后，开始了一种“次生型”的现代化模式。在此模式中，外部危机通常会引发内部危机。甲午战争以及日俄战争后，“小日本”先后打败了两个亚欧大陆强国，这使得中国知识分子以及执政者知耻而后勇，转身东洋，以日为师，学习君主立宪。在当时世界政体的选项中--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共和，中国多数知识分子心仪的是君主立宪制。如梁启超认为，在当时的中国历史环境下，中国适合走君主立宪制，“历观中国数千年致乱之道，有乱之自君者，如嫡庶争立、母后擅权、暴君无道等是也；有乱之自臣者，如权相篡弑、藩镇跋扈等是也；有乱之自民者，或为暴政所迫，或为饥饉所驱。要之，皆朝廷先乱然后民乱也。若立宪之国，则无虑是。君位之承袭，主权之所属，皆有一定，而岂有全壬得乘隙以为奸者乎？大臣之进退，一由议院赞助之多寡，君主察民心之所向，然后授之，岂有操、莽、安、史之徒，能坐大于其间者乎？且君主之发一政、施一令，必谋及庶人，因国民之所欲，经议院之

《清亡启示录》

协赞，其有民所未喻者，则由大臣反覆宣布于议院，必求多数之共赞而后行。民间有疾苦之事，皆得提诉于议院，更张而利便之，而岂有民之怨其上者乎？故立宪政体者，永绝乱萌之政体也。”于是清廷派出了五大臣出国考察，虽有革命党人吴稚刺杀五大臣的插曲，但五大臣一归来就向清廷历陈君主立宪制，打动了西太后。清廷得出结论，只有改革才能消弭革命，抵御外侮，达到国祚永存之目的。当时的中国，革命党人只是自认为历史会站在他们一边的一小撮，他们在各地发动的起义最多也只不过算民变而已。马勇教授是想告诉读者，在百年中国深受激进主义毒害的历史叙述中，清廷立宪进行“政改”的努力无疑被低估了。当时处于火山口的中国，改革和革命都是可选项，只不过改革给国家带来的震荡小一些。当时的许多的革命派如刘师培都回归了主流社会，真要说改革与革命鹿死谁手真的还很难说。然而为什么当清廷着手改革之时便按下了清朝覆亡的倒计时表呢？改革本来就是与革命有着不解之缘，改革就是和革命赛跑。《旧制度与大革命》中道出了其中的玄妙：“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改革一开始改掉了一部分，没改掉的一部分特别显眼，令人厌恶，或者说改掉的部分与不改的部分不匹配，后者只要坚持不改，这就会招来革命。执政集团的两大战略错误彻底葬送了改革。就是说，清末立宪改革的方向是对的，只不过执政集团政治团的错误把一些盟友推到了革命者怀里，革命也便成为改革的替代方案。在立宪改革中，清廷执政者主要有两大致命败笔：一是皇族内阁。行设立新内阁，13名国务大臣中，满族9人，其中皇族7人，被时人称为“皇族内阁”。皇族内阁的出现让拥护立宪的开明士绅大跌眼镜，这正说明了清廷不愿分享权力的本质，再次表现了改革中触动利益比灵魂还难。锦衣玉食的皇族内阁发现君主立宪就是一个陷阱，是心怀鬼胎的汉人想要不费一兵一卒就把满人祖宗从死人堆里打出来的江山夺走，大清的官N代怎能容忍他人做“空手套白狼”的买卖？二是铁路国有化政策，士绅们对此误读，觉得是一场“国进民退”，是“国有资本”挤压民间投资。自满清王朝问鼎中原以来，虽然开明君主通过各种威逼利诱的手段，笼络汉族士绅阶层，并努力学习汉文明以消除自己身上的蛮性，但汉人记忆深处，清入关后“嘉定三屠”“扬州十日”的斑斑劣迹永远也洗刷不了满清的血腥，满清建立的法统是可疑的。在中被迫拖入世界体系之时，恰好碰到一个异族政权。在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政治转型的砝码全压在了执政者不犯错误上，一旦执政者犯了错，执政地位就保不住了，君主立宪也没戏了，就这样改革输给了革命。但无论是改革还会革命，辛亥以后的政治进程一直延续着晚清十年君主立宪的道路前进，中国在实行没有君主的君主立宪。纵观世界革命，要么就如法国大革命那样的血腥恐怖，以君主人头落地告终，要么如英国革命，以一纸契约彬彬有礼地实现虚君共和，或是如美国革命绕过君主暗礁，用宪法将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满清皇室在辛亥的革命洪流中并没有成为革命的靶子，而是以《清帝逊位诏书》换来了《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条件》、《优待皇室条件》，清廷也获得罕见优待，政治上享受外国元首待遇，财务上享受每年数百万两银子的拨款。清廷官员很少被清算，不少人在民国还担任了要职，这种以较少的流血方式实现改朝换代的革命世所罕见。可以说，这场中国式“光荣革命”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清朝执政者对政治改革的开明态度（比如“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汪精卫刺杀摄政王载沣被捕后，摄政王并没有对其用私刑，可见执政阶层的开明）。试想，满清执政者拒不立宪，一旦革命引爆，等待他们恐怕是电线杆上的人头。

4、这本书买了很久但是一直都没特别想看，因为就和假药一样，中国的所谓专家能信任的好像真的不多；无聊周日下午，拿起来看看，就被吸引了，很快就把一本书看完了；毕竟这本书不太长，即使是清末的短短100天其实也不能详细描写所有的方方面面，而且在很多细节方面，书中也没有描述的特别详细；但是作者的历史观，确实以前没有见过的：1 / 印象中的清末，我想十个中国人都会是同一种认识，腐败落后 / 不思进取 / 愚昧 / 贫穷 / ，这些绝对是清末的关键词。但是在这本书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清末，一个相对理性的政府，一群为国为民的政客，文人 / 军人。清朝的当家人的确应该是最关心帝国的命运的，当君主制在俄国和日本面前不堪一击的时候，改革应该是唯一理性的选择，共和不可能，君主立宪就是唯一的选项，但是我学到了历史好像就没这一段，就是有也是贬低为主，刻意刻画清廷的虚伪和狡诈2 / 历史不能假设，也无需假设，过了就是过了，但是现在人需要正视历史。有个看法很奇怪，以前的士人都是越以前的社会越好，他们的当下都是“人心不古，世风日下”；而现在的我们，却正好相反，无论是清末还是民国，旧社会那就是不是人待的地方。除去意识形态的问题，显然我们的历史并没有告诉我们真相3 / 特别感动是书的结尾的部分“尊重历史，善待前人”。否定历史否定前人其实就是否定自己。我们的思想无论如何，其实都和前人脱不开关系，从国民性来说看不出我们和清末民国的人有什么区别，甚至更不如。4 / 革命的浪漫主义情怀待欺骗性是所有青年都需要警惕的，打碎一个旧世界容易，可是建立的新世界还是和旧世界没什么区别，那么那么

多的流血到底是为了什么，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需要都看看5/契约精神啊，契约精神。清廷没有反抗就退位，而民国却有负于人；人无信而不立，政府还是国家都是一样，一个不要个人道德的政党，注定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一定是不值得信任的。书中提到的胡适看法，真真是对的

5、晚清覆灭的历史解构：宪政分权改革下的离心效力几乎所有的论调都一致认为，导致清朝覆灭的最终原因主要得益于宪政改革的推行迟缓，但是，倘若我们能够重新梳理起这段历史也就不难发现，晚清宪政改革进程非但没有表现出迟缓，反而是呈现着急速变革的姿态。尽管清末十余年的宪政探索对于两千多年封建历史来讲，算不上重要的一瞥，但其所产生的影响却足以称得上亘古未有。那场自1901年开启的新政举措，不仅废除了几千年来的科举制度，而且也使得千百年来受行政管辖的司法独立，可以讲，这样的变化已经为后来将要实行的君主立宪制提供了了的准备条件，可令人吊诡的是，“预备立宪”却意外地成为大清灭亡的催化剂。那么，在这个看似悖论的历史谜题当中，我们又当如何解释这样的现象？除此之外，又该从清朝的覆灭因素中吸取哪些经验教训呢？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勇的这本《清亡启示录》无疑是为破解这个耐人寻味的历史难题而创作。作者试图通过重塑晚清时代历史人物和事件，来重新为我们还原整个晚清社会的政治生态。在作者的笔下，保守派的因循守旧，开明官吏的呼吁革新，革命党人的伺机而动，地方势力的狡黠投机等性格特征，都被刻画地十分生动。不仅如此，本书的作者对于史实的剪裁得当和客观评价，也让我们看到了这本书最大的特点所在。作者认为，宪政改革之所以成为王朝覆灭的重要因素，关键在于清末十年中的各项举措已经远远超过了整个社会所能承载的压力。而这样所导致的因素除了打破了农耕文明的“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更为直接的后果让改革成本最终转嫁到底层人民的身上。然而，这样的事态演进不但激发了人民的反抗，而且也让革命党人的乘虚而入，造成不可逆转的态势。除了上述所言的一些因素之外，地方势力与中央王朝的离心也加速了清朝的灭亡。旅居澳大利亚的历史研究者雪饵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改革前提之一必须有足够的权威资源，如果没有就会失控，一失控很多人就会打着改革的名义分权。”实际上对于这一改革中所面临的现状，当时就有人看出了端倪。曾长期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在其1900年为《双周评论》（The Fortnightly Review）所撰写的著名论文《中国、改革和列强》（China, Reform and the Powers）中，引用了《牵毛驴》的著名寓言来说明当时的时局。文中说到，孩子和老人由于听信旁人的观点，所以只能牵着毛驴并最终掉到深沟里。而事实也早已表明，多年后的政治局势也恰如赫德所引用的这则寓言那样一语成讖。而清王朝因听信各股势力改革所引起的社会动荡甚至于最终覆亡，也像极了那个老人和孩子的命运。一个医学常识似乎更能为我们解释这一现象，对于一个孱弱的躯体，以猛药冲击虽然能够达到治病的目的，但可能会因患者的生体机能虚弱反而达到负面的效果。实际上，从日本用三十多年的完成宪政改革，晚清政府却在各股势力的催促下不得不把预备立宪期限压断至五年这样的背景来看，因极端改革而对王朝政体产生的分崩离析的局势显然是在所难免的。然而，对于这本书来讲，作者的笔端并没有因此停留在对宪政制度简单而过于苛责的批判方面，而是跳出了学术争论的窠臼站在特定的历史角度方面为我们还原了当时的历史场景。即便是对此前一度被学术界颇具争议的皇族内阁，作者也并没有用极为苛刻的目光对其进行解剖。相反，作者一反常态的认为：晚清改革当中皇族内阁的贡献大体是积极的，在当时的背景之下，皇族并不是不知道参与现实政治的危害性，但考虑到一些利益纠葛，没能完全引退，但这却为反对立宪派的人士提供了造反的机遇。因此我们也应当看到，所以最后即便是摄政王用宣统的名义下罪己诏来重新废除皇族内阁，也并没有因此而挽回大清的宿命。类似于这样的客观描述一直贯穿于这本书中。在作者新的历史构架之下，革命党人刘师培进而投身朝廷改革也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叛变，抛开特定的历史背景及家庭因素的诱导，这样的描述较为真实地反映出知识分子试图探索改革国家的心路历程。应当说，无论是投身改革，还是奋起反抗，尽管其方式或有差别，但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国家摆脱落后的状态。因此，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之下进行分析，我们也没有理由去责怪他们。毕竟，在一个完全搬照国外经验的并试图进行改革的试验中，谁也不会真正知道这个国家适合什么模式。导致晚清的灭亡因素除了皇族内阁出现和地方势力的离心，铁路收归国有的政令颁布无疑也是架空清政府的重磅炸弹。不过，马勇描述到这一事件时候并没有像主流历史学家那样把四川“保路运动”狭隘地看作是一种单纯的民众抗争，而是清晰地察觉到，清政府这样的出发点尽管很好，但方式不对，威胁到了绅商阶层的利益。实际上，通过资料查询我们也能够看到，当时民营的17个铁路公司，基本都是乌烟瘴气，川汉铁路公司甚至以修建铁路为名搜刮民财，私自挪用资金炒股造成300万两白银亏损，川汉铁路公司以维护老百姓利益要挟中央政府填补亏损，导致爆发“保路运动”，这其中甚至不乏革命党人的煽风点火。所以说，在整个事件当中，最终受害的只有政府和老百姓

姓，因此得利的只不过是一些地主绅商罢了。因保路运动所随即点燃的“武昌首义”显然是压倒清王朝覆灭的最后一根稻草。而之所以会发生政府军队的倒戈以及新军角色从保卫者到掘墓人的转变，作者认为一个重要的因素在于清政府所倡导的“忠诚教育”的所凸显出两面性。相似的情景实际上也在其他领域出现。比如，教育改革本想为王朝培养人才，结果却阻断了旧式知识分子的出路，迫其转为一个不同于士类的新知社群。开放报纸本来是宣传宪政，结果却被革命党人当做是宣传的工具。而诸如此类现象的背后，实际上也都从侧面表明出当时宪政改革急促所必然显露出的弊端。然而，历史最终是不容假设的，我们只能从中吸取一些教训和经验。马勇先生这本《清亡启示录》，虽说是用历史的笔触为我们展现出一种王朝覆灭的“黍离之悲”，但也大致为我们呈现出晚清政治的万象形态，便于我们以史为鉴并汲取历史教训，可美中不足的是，作者在书中对于历史的描述多为散文化语言，难以看到历史资料的引述，对于读者查阅参考史料，着实有些不便。但总体来讲，瑕不掩瑜，这显然不会影响我们对本书的高度评价。笔者相信通过阅读此书，读者们也能够对晚清政治变革有一个重新认知。

6、核心是培养政治的现实感。几个地方很有意思：1.“改良对革命的反制”（包括对刘师培经历的描述）：1894年马关条约后革命抬头，辛丑再加剧。1904年日俄战争意识到君主立宪的必要性，五大臣出访，吴樾自杀式袭击。意识到改良是对革命的反制。对应的人物命运是章太炎和刘师培的经历。2.新政和官民冲突的内在联系（制度成本问题，新政推行过程中的地方利益吞食）：新政必然对应新举措，新举措要钱，这就是新政的制度成本。制度成本向地方的摊派引入了地方利益对民众的进一步搜刮，中央选择性忽略，这就是官民冲突加剧的原因，古今相仿。3.保路运动中的“国进民退”问题（国民各自的立场和苦衷，尤其是民间搞铁路的额外成本）：国的苦衷有三：一是主权，二是金融风险，地方修路不力，集纳民资坏账，三是铁路型号不一，浪费严重。民的不满有二：一是原本修建铁路开放给商业资本，现收归国有，在民看来就是“国进民退”，可见古今何其相似；二是邮政部长盛宣怀不顾民间坏账。3.民国政治对清末新政的接续：辛亥革命不在民国的法统中，袁世凯政府接续的是清末新政的传统，就是没有君主的君主立宪制，直接宪政。资政院成了议会，省总督成了省长。没有五权宪法，没有军政训政宪政，更没有三民主义。4.义和团是清政府应对民族危机所使用的民粹主义手段。5.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靠的是立宪派的力量，也就是给袁上台以合法性，而不是对清的反叛。6.孙中山对清末政治的批判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始终在流亡，并不明白清末新政的真面貌。等等。基本是一个执政史的叙述，很有意思：钱穆所谓的“温情与敬意”，不就是执政史嘛。

7、在我自己想当然的理解中，晚清的历史是不堪回首的，最后十年尤其严重——政治是黑暗而腐败的，政府是懦弱而无能的，官员是颓废而愚蠢的，加之经济崩溃、社会混乱、民生凋敝、内外交困，整个儿的就是一派末日景象，不革命无以改变现状，不革命无以找到出路，所以才会在辛亥革命爆发后一朝倾覆。但是，在马勇教授那里，与我们惯常的理解则迥然不同，甚至截然相反。他在《清亡启示录》中以自己独特的视角看到了一个不同以往的晚清世界，告诉我们一个不一样的灭亡理由：一是晚清政治并非一塌糊涂，官员也并非一味守旧。因为受到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最终结局的震动，为形势所逼，清廷意识到必须而且已经实施了“有计划政治”——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出台《钦定宪法大纲》、制定九年君主立宪政治日程表、改官制、改法制、改教育制度等等。二是晚清的道路选项中，共和非但不是首选，甚至只是弃选。在晚清十年宪政实验中，共和和君宪一直是翘翘板的两端，但日本的接连两场胜利，最终促成了朝野上下的共识——日本才是真正的榜样，实施日本那样的君主立宪制度才是最好的选择，并且正在为此而努力。三是清朝灭亡并非是道路选择的错误，而是由一些技术性错误所造成的。在内，是初选的皇族内阁（这让我想到了现在的萝卜招聘）和铁路干线国有化这两件事的处置不当；在外，则是俄、日有关东三省的去留对国内造成巨大压力；当然还有地方豪强对民政的挟持，新政成本向民间转移造成民怨沸腾等原因，最终将清廷送进了历史。四是武昌起义的原意并非是革命党人发动的革命，而是兵谏，是一次“体制内抗争，其目的是希望清廷遵从民意，改正错误，重回君主立宪的正确轨道”。而之所以会成为我们后来所理解的那个样子，完全是因为民国历史将革命弄成了关键词，一切都往革命上靠造成的，而革命成为历史的必然也是革命党人在故意曲解清廷的变革诚意。五是民国的法统直接接续于清廷，而不是继承自辛亥革命（只是兵谏，革命不存在，这一观点可谓惊世骇俗），所谓的南京临时政府实质上是立宪党人（主导）、革命党人所达成的一个妥协方案，用以逼迫清廷承认共和，打破南北和谈的僵局，并最终将权力转移给袁世凯——这个众望所归的人物。而权力的平稳交接，也有赖于以隆裕太后为代表的清廷的顺从大势。马勇先生的观点颠覆了我既往的很多认识，很难说他没有道理。其实，读完全书不难发现，马勇先生是在用一种非

常正面的、积极的态度，即“温情和善意重新回看自己民族的历史”来看待晚清历史、评价人物，承认“存在的或许都有或多或少的道理”，这与钱穆先生的“温情与敬意”是一脉相承的。如果用一个比喻来讲就是，我们先前看晚清一无是处，是因为我们在用写自我剖析材料的写法，唯恐缺点挖掘得不深不透；而马勇先生看晚清多有可观，是因他在用写年终总结的写法，成绩总是存在的，而且总是主流。当然，在马勇先生的历史叙述并不一定就是历史的真相，还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比如，我们以往都认为光绪皇帝是被慈禧幽禁的，但他却认为他们两个是推进晚清变革的黄金搭档；我先前看到的一本书中讲到刘师培之所以背叛革命，是因为误会以及受其老婆何震挟持，而他却认为其是自主的、理智的选择；在以前对摄政王的评价都是负面的，而在他的眼中，其精明能干，颇有可取之处……然而，不管历史的真相如何，毕竟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使命与主题，具体的真相就交由历史学家们进一步考证吧。其实，马勇先生是把晚清十年放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历史空间中去讨论的，放到百年中国的进退中来考察的。晚清的政治改革在形势一片大好时因为两次不慎就导致王朝在短短一百天里走进历史，这中间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在改革的道路上继续探索，顺着马勇先生的视角再次审视晚清十年，就会发现：中国的事情只有在政治上找到解决的办法，其他方面才能有办法，而政治的方法归根结底就是让人民掌握自己的命运，拥有选择执政党执政者的权力——这不能不使我们警醒，也不能不让我们深思。

8、从今天来感觉晚清的最后十年，仿佛是很久以前的事情，毕竟在大清与现代之间，隔着民国建立，军阀混战，新中国成立这些波澜壮阔的大事。但如果仔细一算，1909年左右，距今也不过才百年，一百年的时间对于习惯了中国历史动辄“百年过去”的口吻来说，其实已经相当短了。但是奇怪的是，如此之“近”的一段历史，往往被委屈的光绪、狡诈愚昧的慈禧这些标签化的人物所固定，加上对一个又一个割地赔款的屈辱，以及不甘心在异族统治中迈进近代文明的不甘，便很难去真正的去面对那一段晚清最后走过的这段历史。本书算是打开了一个口子，让我们真正的意识到，在晚清的最后的几年里，不管是慈禧光绪还是其继任者溥仪摄政王，或者清贵族以及汉大臣，都曾经尽力的实行过变革，不管这变革是为了整个国家，还是为了大清朝廷万世永固，当初他们确实是曾努力过的。即使以今天的角度来回望当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君主立宪”是那一代人所能选择的最好的制度。尽管最后，这个当时看起来最适合中国的制度被中华民国所取代，但是，如书中所说，袁世凯时期的中华民国，更像是一个没有君主的君主立宪，这个民国沿着前朝所未经的事业继续向前，而孙中山先生的军政训政宪政的三个阶段的理论，始终未曾走进袁式民国的选项里。以我浅薄的眼光来看，以当时教育的普及程度，精英政治的确要比全民政治要更适合当时的中国。但是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你觉得这样好些，它偏偏进入了另外的一条轨道，奔腾向前。也许是巧合的左右拉拽，牵引着历史不断向前。也有可能是，这个历史的细节我们根本没有弄清楚。历史的细节决定了历史火车的走向，只是这些细节，我们很难知道了。一百年过去了，当时为了中国崛起的仁人志士，俱以归黄土。不知道他们是否能想到，他们一辈子为之呼喊的，分权制衡，万事议之的政府形态，仍然未能在这片土地上上演，不知道会有什么感觉。愿世界上各民族以平等省分待我，一百年后与一百年前，我们与先人的诉求，是一样的。

9、君主专制不得民心，广大民众竭力反对。而君主立宪在满清贵族统治集团看来，这是对他们至高无上权利的剥夺，不肯让步。在当时的社会，在政治改革方面形成了两个极端，民众要求快速转型，清廷坚持缓慢过渡。最终，在外界环境和内部压力的共同促使之下，清廷发出了信号。但这，却是根导火线。清廷在做出“收回铁路权限”和成立“皇族内阁”两个致命决定之后100天步入历史。看完这本书，我在想：适合当时中国的真正的改革道路是什么？在我看来，当时的中国人处于一种蒙昧的状态之中。在国家改革道路面前，缺少独立思考的人。很多人倡导的是照搬照抄，也有很多人摇摆不定。像孙中山一样有独立的思想和坚定的信仰的人，少之又少。当时的中国，处在一种复杂的局势之中。外部力量强大，对中国虎视眈眈；而内部人民，却寻找不出一天平稳、快速的发展道路。打个激进的比方，就像家里的房子着火了，而人还在想着将水桶全部找到再去救火，原本能够扑灭的火，在主人纠结水桶还缺一个的情况之下，已经燃成大火不可扑灭。其实，水桶完全可以边扑火边寻找。所以，适合当时中国的道路，就是独立、自主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没有封建主义君主专制的不得民心、有悖时代潮流；没有君主立宪的缺乏稳定、不符合国情。中国要走的是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改革道路，而如今我们依然在改革的道路上继续探索。就像书中所说：未来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还政于民，依然是必须跨越的一道坎儿。中国只有政治有办法，其他方面才会有办法，而政治上的办法千头百绪，归根结底就是让人民掌握自己的命运，拥有选择执政党执政者的权利。”

《清亡启示录》

《清亡启示录》

章节试读

1、《清亡启示录》的笔记-第149页

非袁莫属是当时国内外共识怎样一个袁世凯，怎样一种选择

2、《清亡启示录》的笔记-第212页

政治上的办法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让人民掌握自己的命运，拥有选择执政党执政者的权利好敢写啊

3、《清亡启示录》的笔记-第79页

就这场（辛亥）革命集体情形来说，显然具有偶发性，并不是历史因果链条中的必然

4、《清亡启示录》的笔记-第33页

刘师培的妥协是生活所迫，也是部分革命者当时的真实所照

5、《清亡启示录》的笔记-第41页

中国的政治史也许就是中央和地方的对抗史

6、《清亡启示录》的笔记-第1页

历史的洪流无法阻挡，当时的中国到底缺了些什么，耐性？共识？又多了些什么，盲目？纷争？马老师的分析完全改变了我对清末历史的认识，不过就本书而言，章节间重复和不连贯的地方明显不少，有拼接而成的嫌疑。

7、《清亡启示录》的笔记-第183页

如果一场革命不能在社会经济层面发挥功能，这场革命总显得有点不足，或者不够到位。

《清亡启示录》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